



大战后 被保尔 的国际政界要人

中国物价出版社

二战后被谋杀的国际政界要人

延华 新宇

中国物价出版社

前 言

刺杀政界要员，古已有之。无论是东方的中国、印度，还是西方的希腊、罗马，都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刺杀政界要员的事件。这种使用最残酷手段的政治斗争，是阶级、社会、宗教、家族等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二战以来，政治谋杀愈演愈烈，谋杀手段也更加隐蔽，更加残酷。这不仅引起世界人民一次又一次为之震惊，而且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

本书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被刺的国际政要三十余人。他们的“故事”是惊心动魄的：有的血染总统府、总理府、政府宾馆，有的毙命于检阅台、讲演台，有的在飞机、汽车爆炸中殒命，有的被鲜花隐藏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有的则死在自己的亲属、卫兵的枪口下……这些被刺的政界要员，不乏独裁暴君，但多数是为本国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领袖和政治家，其中有的还为人类和平和进步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有的曾访问过中国，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尊敬的朋友。他们之所以死于非命，有其政见分歧、民族隔阂、宗教偏见、家族纠纷以及个人恩怨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书中在记述谋刺经过的同时，还追溯了死者的生平经历、家族宗教渊源、政治作为和该国的历史背景，以及凶手的刺杀动机、蓄谋准备和最后的下场，使读者不仅能够对谋杀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掌握广博的世界知识，开阔视野。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在这种大趋势下，国际社会正在协力反对恐怖主义罪恶行径，人们不愿看到此类悲剧再度发生。但是，国际政坛风云变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本书脱稿之际，又传来意大利黑手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引爆汽车炸弹，相继将意大利著名法官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炸死的噩耗，尤其是在意大利警方严密防范的情况下，黑手党的暗杀活动仍然频频得手，不能不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和忧虑。可见，反恐怖活动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本书承蒙许多朋友帮助提供中外文资料，并对编写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著者

1992年8月

目 录

“请宽恕这个可怜的凶手”

—— 圣雄甘地非凡的一生 (1)

“我喜欢让一个小人物射中头部”

——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遇刺记 (6)

血溅总理府客厅

——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遇刺记 (8)

总统府被攻陷

—— 南越总统吴庭艳被政变部队击毙 (10)

“零年因素”再次应验

——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记 (14)

犹如一颗明星陨落

——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记 (23)

“使那些只使用武力而没有道理的人遗臭万年”

—— 智利总统阿连德誓死抵抗政变部队 (26)

死在侄子的枪口之下

—— 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执政前后 (27)

中央情报部长设下鸿门宴

—— 韩国总统朴正熙饮弹毙命 (32)

夜幕下总统府响起枪声

—— 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在政变中丧生 (34)

政府宾馆遭到炮轰

—— 孟加拉总统齐亚·拉赫曼遇害记 (36)

总理府发生强烈爆炸

—— 伊朗总统拉贾伊和总理巴霍纳尔同时殉难 (38)

接受检阅的部队中冲出刺客

—— 埃及总统萨达特血染检阅台 (41)

就任前夕的恶运

—— 黎巴嫩当选总统杰马耶勒遇害记 (46)

悲剧发生在客机着陆后的瞬间

—— 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遇害记 (49)

政见之争演变成流血冲突

—— 格林纳达总理毕晓普遇害记 (55)

卫兵突然向她开枪

—— 印度总理英·甘地遇刺记 (58)

电影院外响起枪声

—— 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记 (61)

直升机在空中爆炸

—— 黎巴嫩总理卡拉米遇害记 (64)

护航机上的飞行员突然报告

——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遇害记 (67)

上任 17 天即遭不测

—— 黎巴嫩总统穆阿瓦德遇刺记 (73)

花束中藏有炸弹

—— 印度总理拉·甘地遇刺记 (75)

鲜血染红了讲台

—— 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布迪亚夫遇刺记 (80)

黑手党连续引爆汽车炸弹

—— 意大利两著名法官惨遭杀害 (83)

国际政坛刀光剑影

—— 其他国际政要被谋杀事件 (86)

「请宽恕这个可怜的凶手」

——圣雄甘地非凡的一生

甘地是印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独立前国大党的首领。他的名字早已传出他的国界，以致于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 1930 年的世界风运人物，认为他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

甘地的全名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于 1896 年 10 月 2 日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土邦的吠舍姓家族，父亲卡郎昌德·甘地和叔叔杜尔希达斯·甘地先后当过波尔班达土邦的首相。母亲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每天都要去印度教至尊的毗湿奴神庙去朝拜，讲求慈爱为怀。这样的家庭环境对童年的甘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地 13 岁时，依父亲之命，按当地风俗举行了童婚。和他同年的妻子嘉斯杜白是个文盲。甘地始终如一地热爱他的妻子，并且和她白头偕老。甘地 18 岁中学毕业后，进入巴弗纳加尔的萨马尔达斯学院学习，同年到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在英国，他开始接触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宗教哲学思想，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891 年取得律师资格后返回印度，在孟买、拉奇科特等地从事律师工作。

1893 年，甘地应印度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之请，去南非为其处理债务纠纷。当时南非是英国的殖民地，许多印度侨民在那里充当矿工等繁重的苦力，也有少数印度侨民在那里经商或从事其他自由职业。这些印度侨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白人当局的歧视。甘地也亲身感受到了殖民当局的种种歧视，备受侮辱。他乘坐火车，买的是头等车票，可是白人警察却让他去货车厢；当他断然拒绝后，他被推出头等车厢，行李也被扔在站台上。他乘坐马车，白人马车管理员蛮横地要他坐在其脚下的踏板上；当他拒绝后，遭到一顿毒打。当他从印度侨民朋友们那里听到，他们都有过同样遭遇时，

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积极参加了当地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1894年,他在南非创立印度国大党。从此,他除了中间几度回国以外,在南非居住了21年,并且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南非。

甘地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为自己的侨胞争取公平待遇的斗争中,以非暴力主义作为主要思想武器。非暴力主义是他对宗教、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印度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后的特殊产物。甘地家族信奉的毗湿奴教派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仁受,不杀生,素食。甘地熟悉印度教经典,“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式如绝食、祈祷、饮伊尼马水(即净水)等几乎都是宗教仪式。但是,甘地是根据斗争的需要和自己的方式去援引和阐述印度教教义的。他自己曾说:“我对于印度教经典的信条不是逐字逐句地接受它,无论何种解释,无论它多么深奥,假如同理性或道德相违背,则我必定不愿受它约束。”因此,这种非暴力主义的斗争方式,既易于为一般笃信印度教的群众所接受,又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所以其影响和作用也就越来越大。

甘地受基督教的《圣经》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如梭罗、罗斯金、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在给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你们给了我一位老师,他便是梭罗,他在他的论文《文明反抗的责任》中给我在南非做的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证明;英国给我一位罗斯金,他的《给那后来的》,在一个晚上就把我从一个律师和城市居民改变成为乡下佬;俄国又给了我一位托尔斯泰,这位老师给我的非暴力主义以合理基础。”1904年,甘地读了罗斯金的《给那后来的》一书后,记下了三点启示:“一、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二、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等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同的权

力;三、劳动的生活,即种地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据此,甘地用1000英镑在德班附近购买了100英亩土地,建起一座村庄,起名“凤凰村”,他带着妻儿和友人去那里居住。他要求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后来,这里成为甘地在南非领导非暴力斗争的基地。托尔斯泰对甘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在《天国在你心中》一书中所宣传的“消极反抗”、“普遍的爱”、“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良心论”等等,都被甘地毫不保留地接受下来,并且贯彻在行动中。1910年,甘地用印度商人捐赠的2.5万卢比,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1100英亩土地上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和“凤凰村”一样,该农场也订有共同劳动和同样享受的章程。这里成为他非暴力斗争的又一个基地。

甘地就是运用这种非暴力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同南非殖民当局展开斗争。1906年8月,特兰士瓦州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法案(又称“黑色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要领取登记证,以便当局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领导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制运动,许多印侨烧毁了登记证。南非当局以大肆逮捕相威胁,但是无济于事。1908年,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不得不与甘地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当局收回“黑色法案”,释放被捕者,印度人则自行登记。事后,南非当局并无意取消种族歧视的法案,而是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次发起非暴力抵制运动。1913年,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制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00多名印度矿工和妇女、儿童,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特兰士瓦州“和平进军”,要求彻底取消“黑色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南非当局立即进行镇压,并且将甘地投入监狱。12

月,印度侨民举行大规模罢工,迫使南非当局释放了甘地,寻求谈判解决问题。1914年1月,南非当局被迫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制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

甘地在南非领导非暴力抵制运动中表现出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并非由于他具有超人的天才,更非由于财富和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而是他能够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为自己的侨胞争取公平的待遇,从而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戴和拥护。在南非的印度侨民中,有一种契约工人。他们同白人主人签有一定年限的契约,在此期间没有人身自由,要像奴隶一样为主人干活,处境极其悲惨。有一天,一个契约工人遭到主人的殴打以后,来到甘地这个年轻的律师面前,摘下头巾。由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契约工人在上等人面前都必须摘下头巾。甘地看到这个衣衫褴褛,两个门牙被打落,血流满口的契约工人,心里很难过。甘地劝他缠起头巾,并说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对这个可怜的契约工人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甘地请一位医生检查了这位契约工人的伤势,并且开了证明书。然后甘地领着他去见县长,成功地使这个契约工人脱离了原来那个凶恶的主人,到另外一家去工作。这件事在南非的广大契约工人中迅速传开,契约工人们都把甘地当成自己的朋友。包括契约工人在内的劳苦大众一旦觉悟过来,投入运动,立刻就显示出惊人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而甘地则从这些劳苦大众的纯朴、忠诚和勇敢中得到启发,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了一套能够唤起和领导劳苦大众共同斗争的政治工作方法。

1915年,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这时

他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了。他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出门总是坐三等车。他丢下笨重的外衣和白围巾,只穿一件衬衣和围一块腰布,戴一顶廉价的克什米尔式帽子,打扮和穷苦人一样。1917年,甘地运用非暴力斗争的经验,在比哈尔的昌帕兰县发动靛青种植园的农民反对欧洲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迫使种植园主屈服,废除了流行已久的“三分田制”。这是甘地回国后首次领导的民族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斗争中,他团结了一些当时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马扎鲁尔·哈克、克里帕兰尼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亲密伙伴和忠实门徒。翌年,甘地又领导了阿麦达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是他第一次把非暴力斗争方式应用在劳资冲突上。当罢工拖延下去而又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时,工人们表现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在这关键时刻,甘地声明:“除了罢工工人团结起来,坚持到底,直到达成协议,我绝不吃一点东西。”罢工工人们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继续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此后,甘地经常把绝食作为动员群众、坚持斗争的武器。

当时,印度资产阶级试图把整个民族团结在“自治”的旗帜下,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恰是动员整个民族去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甘地回国以后成功地领导的几次非暴力斗争,使印度资产阶级承认他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领袖。1919年,甘地开始参加印度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受委托修改国大党党章。甘地在党章中规定党的宗旨是:“如果可能,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随即发动“不合作运动”,号召人民抵制英国殖民政府的学校、法庭、立法机关,不购买英国货,辞去官方职务。英国当局公布的“罗拉特法案”规定,警察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

子,并且不经公开审判就可以长期监禁。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措施,甘地在孟买召开大会,发动全国总罢工。英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在旁遮普的阿姆利酿成了死1200人、伤3600人的大惨案。甘地和国大党坚持开展不合作运动,全国各地办起了印度人自己的学校、商店,募集了大量的运动基金。甘地在孟买带头焚烧英国布,坚持穿用国产布。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共制造了200万架手纺车,并且有50万工人举行罢工,把不合作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甘地推动了印度国大党的改组,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扎根于小城镇和农村,效率很高的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

1922年2月2日,乔里乔拉的农民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开枪镇压。愤怒的农民放火烧毁了警察局,把22名警察围困在警察局内烧死。这时,甘地认为运动已超出了他所规定的范围,要求国大党宣布无限期推迟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计划,代之以推广手工纺织、教育和改革活动。英国殖民当局大肆逮捕参加运动的人,而许多人高兴地列入狱。3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甘地,判刑6年。在狱中,甘地写了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4年5月,甘地因病获释。此后,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1930年1月,印度国大党在拉合尔年会上发表了“印度独立宣言”,并且把1月26日定为全国“独立日”。3月,他率领人们步行200多英里到海边熬盐,以表示不服从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令。5月,甘地再度被捕入狱,他的追随者遭到逮捕的达3万多人。翌年3月,甘地同英国总督欧文进行谈判,签订“甘地—欧文协定”,规定国大党方面停止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方面停止镇压。这一协定引起国大党内外不满,英国殖民当局也不想放弃镇压政策。8月,甘地要求同英国举行关于印度自治的谈判,遭到拒绝,遂再次发动全国性不合作运动。1932年初

他又一次被捕。出狱后,甘地退出国大党的领导,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计划,教育占人口85%的农民,提倡手工纺织和其他家族手工业,改革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再度活跃。他和国大党利用英国自顾不暇的时机,发起了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全国性不合作运动。1942年8月,甘地和国大党全体领导人被捕。1943年2月,甘地在狱中绝食,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暴行。5月,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获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甘地和国大党继续领导印度人民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使英国政府提出了同意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自治的“蒙巴顿计划”。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自治领。

甘地内心并不赞成印巴分治。他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怀着虔诚的信仰,并且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使人与其内在的真理永不分离、永远纯净身心。他成功地在国大党中罗致著名的穆斯林领袖,力图调和两大教派的传统冲突,希望他们能够在反英的民族和睦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这些努力都未能消除教派利益的对立。随着独立的临近,特别是由于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教派之间的对立日趋扩大,终于导致穆斯林联盟的分立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在印巴分治前后,在孟加拉、比哈尔等邦发生了大规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甘地不辞辛苦地在两派教徒中间进行说服工作,排解纠纷。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真诚祷告会场中,被一个极端分子突然开枪击中要害。在场愤怒的群众抓住凶手,并要严厉惩办他,而甘地捂着伤口,发出了最后的声音:“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甘地为人诚实、正直、谦逊、廉洁。他那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所到之处,总有成千上万的普

通农民从几十里外闻风而来，向他顶礼膜拜。在印度，无论是激进派还是稳健派，知识分子还是工农群众，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虽然有人不同意他的思想，甚至反对他的主张，但是对于他的品格无不肃然起敬，以到尊称他为“圣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地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友好感情。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甘地的积极支持下，印度派出了包括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5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甘地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日本不仅在企图征服你们，而且也想用廉价的机器产品来征服我们。我们派遣一个医疗队到中国，表示了我们的友情和善意，但这不能使我满意，因为我知道我们能做的还应当更多一点。”甘地十分珍视中印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他说：“我期待着中印之间的真正友谊。这种友谊不仅基于政治或经济的相互依赖，而且建筑在相互的亲善之上的，这种友谊在人类中将产生真正的友爱。”

“我喜欢让一个小人物射中头部”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遇刺记

1951年7月21日中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前往耶路撒冷清真寺参加祈祷。他似乎预感到将有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路上，他向陪同人员谈到了那些他邀请来耶路撒冷祈祷而都以各种借口不来的人。“他们害怕了，”阿卜杜拉说：“如果我必须去死，我喜欢让一个小人物射中头部，这是最简单的死法。我宁肯这样死，也不愿变老和成为一个负担。”

在阿卜杜拉驱车前往清真寺的沿途街道，布满了担任警卫的军队，阿拉伯军团第10团在哈比斯上校的指挥下提供贴身保镖。阿卜杜拉抵达清真寺门前时，那里有一个仪仗队，还有一大群崇拜者和围观者。在围墙里面，也有军队在担任警戒。阿卜杜拉感到这样森严的警戒似乎太过分了，他对哈比斯说：“别把我关起来，哈比斯。”随即他走进了清真寺的大门，受到沙伊赫的欢迎，并弯腰吻了他的手。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大门后面闪出来，举起手枪向阿卜杜拉射击。阿卜杜拉立刻中弹倒下，头巾滑落在地板上。凶手又向随行的阿卜杜拉的孙子侯赛因射击，子弹被侯赛因胸前的一枚徽章弹了回去。这时，警卫们的枪响了，把凶手身上打得尽是窟窿。随后，阿卜杜拉的遗体由飞机运回了安曼。

约旦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公元630年前后属阿拉伯帝国的版图，1517年，被土耳其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

国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阿卜杜拉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外约旦的安曼的。

阿卜杜拉于1882年出生。他属于伊斯兰教最尊贵的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因被怀疑同情阿拉伯民族分子而于1893年流放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卜杜拉是在这个都市社会中长大成人的。到1908年他的父亲返回汉志并成为国王时，他已经是土耳其议会的成员。他熟悉土耳其语，也能讲英语。随后他成为父亲在国务事务中的得力助手。1915年，其父与驻埃及英国当局举行秘密谈判，他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6年，其父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阿拉伯大起义”，阿卜杜拉和他的两个兄弟阿里和费萨尔率领阿拉伯军队同土耳其作战。两年后，在英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下，终于把阿拉伯各省从奥斯曼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阿卜杜拉于1902年同他的表妹谢里法·穆斯巴赫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塔拉勒和一个女儿哈雅。1912年他同一位土耳其女人结婚，生下一个儿子纳伊夫和两个女儿马格布拉、布尼拉。多年后，他又同苏丹女人纳希达结婚。

1920年，大马士革的“伊拉克国会”立阿卜杜拉为伊拉克立宪政体的国王。阿卜

杜拉把王位让与弟弟费萨尔一世。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伊拉克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结果被英国军队镇压了。法国军队强占了大马士革,驱逐了费萨尔一世。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出现了一个自称兄弟会的狂热的穆斯林派别,以惩罚那些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的教徒为自己的使命,到处袭击贝都因游牧民。阿拉伯人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就在这个时候,阿卜杜拉带着一小支正规军队来到安曼,受到热烈欢迎。1921年3月,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同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谈判。阿卜杜拉最吸引英国人的一个方面,是他无须英国军队的帮助就能建立对外约旦的控制,而英国这时正极力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以减轻军事和经济负担。丘吉尔建议外约旦应当成为哈希姆公国,并把这个公国交给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同意组成一个政府,尝试6个月。4月11日,阿卜杜拉组成了他的第一届政府,并立即着手组建一支军队。用它来恢复法律和秩序。他先邀请英军上尉皮科指挥他的阿拉伯军团,后来又邀请英军上尉格拉布出任“沙漠指挥官”。格拉布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骆驼警察部队,在二三年内就成功地平定了这块沙漠。后来皮科退休,格拉布出任阿拉伯军团指挥官。格拉布组建了沙漠机械化部队,并把它训练和装备成一支精锐部队。阿卜杜拉对他的阿拉伯兵团异常厚爱,很少错过看望这支部队的机会。

外约旦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阿卜杜拉从执政初期就积极谋求国际上的合法地位。1924年,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由于他想要建立一个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在内的阿拉伯联合王国,遭到了英、法以及阿拉伯各国政府的猜忌,直到1946年英国才承认外约旦独立。外约旦定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阿卜杜拉为第一代国王。

在1948年的阿以战争中,埃及等阿拉

伯军队一败涂地,只有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显示了惊人的战斗力。阿卜杜拉坚持派阿拉伯军团进入耶路撒冷,才阻止了以色列军队对这座城市的进攻,拯救了阿拉伯人的圣地。阿拉伯军团保护了约旦河西岸的剩余部分,并于拉特伦守卫战中挫败了以色列军队。到1949年4月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停战协定时,约旦依然占有约旦河西岸,并于1950年正式并入约旦哈希姆王国。

阿卜杜拉是唯一一个在阿以战争开始之前准备接受联合国关于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决定的阿拉伯领导人。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力量不抱任何幻想,并鄙视那些随意宣称要把犹太人赶下大海的人。正因为这一点,尽管后来他迫不得已参加了对以色列的作战,并且为阿拉伯人保护了耶路撒冷旧城,但是一些阿拉伯人仍然中伤和辱骂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则要将他置于死地。

阿卜杜拉死后,阴谋集团很快被揭露出来。一个叫法尔阿特的人在咖啡馆里策划了刺杀阿卜杜拉的阴谋,同谋还有乌卡赫兄弟俩和一个叫侯赛尼的人。他雇佣了阿舒作为杀手。阿舒被当场击毙,阴谋集团的4个人全被绞死。

当时,约旦王储、阿卜杜拉的长子塔拉勒正在国外接受治疗,阿卜杜拉的葬礼被推迟到塔拉勒完成治疗以后。9月6日,塔拉勒返回约旦,并登基即位。但是,治理国家的压力使他的健康继续变坏,在位不到一年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儿子侯赛因继承王位。1952年8月12日,侯赛因与他的母亲及兄弟、妹妹正在瑞士度假。尽管对国内发生的事情略有所闻,但当一位旅馆侍者托着银盘子把一封信交给他时,他还是大吃一惊,因为信封上赫然写着“侯赛因国王陛下”。这位17岁的学生意识到,他必须结束学校生活,去挑起管理约旦哈希姆王国的重任。

血溅总理府客厅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遇刺记

1959年9月25日上午九点半左右，锡兰（1948年独立，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1972年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官邸像往常一样安静肃穆，井然有序。客厅里的人衣冠整洁，期盼着会见总理的时刻，其中还有两位身着袈裟、“神情平和”的僧侣。“总理来了！”不知是谁惊喜地喊出声来，只见班达拉奈克总理此时已步入客厅，面带微笑地向客人们走来。当这位在国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总理正准备向等候的客人施礼时，只见一个和尚突然露出狰狞的面孔，他迅速地袈裟下面掏出手枪，径直向这位措手不及的总理连发六枪，罪恶的子弹穿过了总理的脾脏和肝，他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其他客人都惊呆了。第二天上午八时，班达拉奈克经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

班达拉奈克的不幸逝世象晴天霹雳震撼着全国。锡兰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向总理致哀的群众络绎不绝。凡是出家的和尚都感到万分耻辱，抬不起头来。一时间，和尚不敢上街，因为旁人都对他们侧目而视。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司机拒绝让他们上车。尽管班达拉奈克这个由基督教徒皈依佛门的受害总理临终前还呼吁“宽恕那个愚蠢的人”，但是人民并没有轻饶杀人犯，议会通过了撤销废除死刑的法案，1958年暂时停止的死刑又恢复了。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班达拉奈克1899年出生在一个显贵的家庭。祖辈数代为官，父亲曾是英国驻锡

兰总督的侍从武官和顾问。由于家庭条件十分优越，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早年毕业于科伦坡的圣·托马斯学院，后来又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学业优异，尤其是他雄辩的口才，使其名噪校园。一度他与后来出任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的麦克唐纳竞选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一职，使麦克唐纳惨遭失败。由于班达拉奈克词锋犀利，因此获得了“剑”的外号。

1923年，这位牛津的优等生返回国土，当上了律师，但两年以后，他弃法从政。1931年，他以压倒优势当选为议员，尔后入阁当部长。前后达19年之久。1938年，他出国访问途经新加坡，在那里应邀发表演讲，结果轰动了舆论界。人们称他的演说如流水行云，简洁而富于鼓动性。班达拉奈克的机智与口才，使出身贵族、当过议员的西丽玛沃为之倾倒。她羡慕他的才华，赞赏他的观点，愿意支持他的事业。总之，班达拉奈克的出众才华和翩翩风度像磁铁般地牢牢吸引着她。1940年是班达拉奈克难忘的一年。这一年，41岁的他与24岁芳龄的西丽玛沃喜结良缘。

1951年7月，班达拉奈克因反对约翰·科特拉瓦拉政府奉行的“崇拜西方”政策，愤然退出了政府和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他主张拆除英国在锡兰的海军和陆军基地，将国外的银行企业收归国有，使锡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为此，他创建了锡兰自由党。西丽玛沃完全支持丈夫的政

策主张,在此后的每次竞选中,她都积极为自由党奔走,为丈夫的事业献计献策。1956年4月,锡兰举行独立后的第三次大选。三党联合阵线击败了统一国民党,自由党主席班达拉奈克出任总理。在职期间,他为自己祖国的繁荣昌盛,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回了英国长期侵占的海军和陆军基地,并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曾主动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锡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达拉奈克总理奉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主张亚非国家团结友好合作,为此,深受国内人民和国际进步人士的拥护和爱戴。

班达拉奈克总理的遇害,给政府和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混乱中,内阁里资历较深的教育部长达哈那亚克被推选为总理,议长德席尔瓦接任自由党主席。不久达哈那亚克另起炉灶,率领一部分人马退出了自由党,组织新党。元气大伤的自由党这时几乎难以站立。这年12月4日,议会解散,定于翌年3月举行新的大选。

新主席德席尔瓦领导自由党投入竞选,但他远没有已故领袖对选民的那种号召力。选举揭晓,自由党降为第二大党,统一国民党组织政府。由于这届政府在议会中也不拥有绝对多数,执政不到一个月就倒台了。新的大选规定在这年7月进行。

这次大选为班达拉奈克夫人提供了机会。她因丈夫猝亡而悲恸不已。已故丈夫临终前曾要求她“以勇敢和刚毅的态度面对局势”。她想起了丈夫的遗言。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她决心要为她的丈夫创建并领导过的党积极竞选。

1960年5月,自由党领导机构改组,班达拉奈克夫人当选为该党主席。接着,她便全力投入新一轮大选。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竞选策略是,结成反对统一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不提新的政治主张,只提她已故丈夫的政治纲领,旨在重新激起选民对她

已故丈夫的党的同情和信任。她奔走疾呼,以期选民们拥护她已故丈夫的党重新掌权。她尽心竭力,有一天竟发表了25次竞选演说,当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演说快要结束时,她晕倒了,她每次讲话都怀着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声泪俱下。为此她感动了一些本来持中立态度的选民,结果他们把赞成票都投给了她。

1960年7月20日大选的结果,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自由党赢得了稳定多数,它的席位超过了其他所有政党的总和。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一位妇女当总理标志着亚洲社会发生了变化。”于是,班达拉奈克夫人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从此许多人怀着浓厚的兴趣纷纷预测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将怎样治理她的国家。

在总理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班达拉奈克夫人坚定地表示她将继承已故丈夫的遗志,拥护他提出的一切主张,对内实行“中间党的政策”,“代表全体农民的利益”;对外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决心“沿着中间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女总理根据丈夫提出的国有化政策,先后将人寿保险公司以及私人资本的锡兰银行改为国营,并成立了向农民发放贷款的人民银行,尤其是不顾美英两国的“抗议”和威胁,接管了三家美英石油公司的许多设施,建立了锡兰石油公司。这些对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举行,班达拉奈克夫人撂下了国内纷繁的公务,坚持赴贝尔格莱德参加会议,从而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为了促进中印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女总理于1962年12月倡议召开了亚非六国会议,接着于1963年1月访问了中国和印度。女总理的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锡兰的国际地位,而且引起了人们对班达拉奈克总理的怀念。

总统府被攻陷

——南越总统吴庭艳被政变部队击毙

1963年11月1日，南越西贡嘉隆宫——吴庭艳的总统府周围响起了枪声。政变集团——“革命军人会议”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和伞兵部队迅速包围了嘉隆宫，并发起攻击。吴庭艳已经预感到美国蓄谋推翻自己，做出了种种防范措施，但是防不胜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心腹将领杨文明、陈文敦、孙室亭等已经被美国收买，秘密组织了政变集团——“革命军人会议”；更没有料到自己的总统府会突然遭到攻击。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儒率卫队拼死抵抗，盼望忠于自己的部队赶来增援。政变集团在进攻嘉隆宫的同时，由国防部长陈文敦出面，于军官俱乐部宴请高级军官，于酒席桌前将吴庭艳的亲信将领全部逮捕。于是，吴庭艳的援军也就不可能出现了。吴庭艳和吴庭儒率卫队坚守到第二天，明白援军已经无望，就从总统府的地道里逃出来。可是没跑多远，就被政变部队的士兵发现。一阵乱枪射来，吴氏兄弟双双被击毙。

吴庭艳是越南中部广平省人，1901年1月3日出生于越南古都顺化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吴庭可当过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的礼仪和宫监大臣，他的大哥吴庭魁，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曾任广南省省长。凭着这种关系，吴庭艳21岁时，就当上了广治省潮丰县县长。那时，“新越南革命党”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等正在越南中部建立组织，吴庭艳对这些革命政党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手段。

从1929年到1933年，吴庭艳步步高升，相继被任命为广治省海浪县县长、宁顺省省长和平顺省省长。在此时间，吴庭艳在这些地方逮捕和屠杀了数以百计的革命人士。1933年3月，吴庭艳被提拔为保大王朝的内政大臣。

1940年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以后，

吴庭艳同当时担任广南省省长的哥哥吴庭魁一起进行间谍活动，偷窃法国的秘密文件供给日军。这种行径被法国殖民当局发觉，吴庭魁被革职，吴庭艳遭到逮捕。后来，一个名叫横山的日本驻越南的总督（省长）救了吴庭艳，并把他带到西贡日本宪兵司令部去，让他继续进行间谍工作。

1945年，在日本法西斯投降和越南八月革命爆发以后，吴庭艳在越南中部富安省被越南革命军队逮捕，六个月后被释放了。吴庭艳于1964年跑到河内，秘密会见了当时驻印度支那法军总司令莫利埃，重新充当了法国殖民当局的间谍。1946年12月，越南全国抗法战争爆发之后，吴庭艳被法国殖民当局调回西贡。他组织了一个所谓“民族主义运动”，企图破坏和对抗越南人民的神圣抗战。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个运动失败了。吴庭艳还参加了法国殖民当局的老傀儡保大的复辟活动，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曾数次到香港与保大会晤。

1950年，吴庭艳赴美国，就读于新泽西州雷克乌德城玛丽诺尔神学院。此间，与美国政府要员经常接触，颇受赏识。美国《时代》周刊披露：“美国相信吴庭艳……是一个最适合领导越南人民走向真正独立的人物。”

1954年6月，美国支持吴庭艳回西贡，充当保大傀儡政权的“总理”。吴庭艳在美国策划下，竭力排挤南越傀儡政权内部的亲法势力，并且用武力消灭了同他对立的高台教、和好教和平川派等教派势力。1955年10月，吴庭艳玩弄所谓“公民投票”的把戏，废黜了受法国支持的傀儡皇帝保大，非法成立所谓“越南共和国”，自封为“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集南越军政大权于一身。1961年4月，吴庭艳再次导演了“总统选举”的丑剧，坐在了“总统”的宝座上。

吴庭艳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极端粗暴地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企图长期分裂越南。他始终顽固地拒绝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举行协商，并在1956年3月举行片面选举，成立所谓“制宪议会”。他公然把日内瓦协议签订日定为“国耻日”，并迭次声明“不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甚至对越南国际委员会加以诽谤和打击。

吴庭艳自称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实际上他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上台以来，除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和用卑鄙手段清洗异己以外，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西斯法令，大肆屠杀和囚禁南越爱国人民。他更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使越南南方变成人间地狱。

为了维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吴庭艳用他自己的家庭掌握了南越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和特务系统的全部权力，建立起一个十足的家族独裁政权。

吴庭艳弟兄六个，他本人是老三，除去1954年秋被越南政府处死了的老大吴庭魁外，其余几个都高据要津。他二哥吴庭淑名义上是顺化的天主教大主教，实际上控制了南越的一切教堂、教区和神甫，掌管南越的全部宗教事务。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是吴庭艳的“政治顾问”，同时，吴庭儒还控制着南越的特种部队，领导着吴庭艳的一个“对居民进行侦察”的特务组织。吴庭艳的另一个弟弟吴庭练，是南越驻英国“大使”，实际上是南越驻欧洲各“大使”的上司，并且是南越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吴庭谨是吴庭艳最小的一个弟弟，是十七度线以南的中越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当地官吏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吴庭谨还和他的姐姐勾结在一起，垄断了中越的大米买卖。他姐姐在顺化市还拥有汽车买卖的垄断权。他姐姐的女婿陈忠容，曾任吴庭艳政权的国防部“副部长”。

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儒的老婆陈丽春，是所谓“国会议员”。他和吴庭儒操纵着整个工商业系统，是一对投机倒把和贪污受贿的能手。凭着裙带关系，陈家的许多人也分得了“政府”的要职。此外，吴庭艳的干儿子吴重孝，是南越的特务头子，充当“公民事务部部长”。

吴庭艳家族独裁政权，在其九年来的法西斯血腥恐怖统治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所有具有民族正义感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愤怒。1963年6月由于南越人民自卫武装的节节胜利和吴庭艳残暴镇压迫害佛教徒所激起的群众斗争，吴庭艳的政权岌岌可危。美国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面临着彻底的失败。失尽人心的吴庭艳集团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被美国认为是它打赢这场战争的障碍了。于是美国总统肯尼迪派洛奇代替瑞尔丁出任美国驻南越大使，而洛奇的任命是美国同吴庭艳关系上“变得强硬起来的一种迹象”。

在洛奇到任之前，美国积极准备发动推翻吴庭艳集团的政变。美国一方面通过对吴庭艳集团镇压佛教徒的活动伪装“痛心”，借以收买人心，贬抑吴庭艳集团；另一方面竭力颂扬南越军队的作用，在军队中间物色新代理人。美国宣传机器公开扬言美国“希望看到西贡成立一个新政府”。

吴庭艳当然懂得美国更换大使意味着什么。于是同美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斗争。吴庭艳一方面加紧镇压佛教徒，殴打美国记者，不许他们报道有关佛教徒的消息，防止佛教徒的斗争被美国利用来发动政变；一方面设法挫败美国发动政变的企图。他把亲信部队集中到西贡来保卫自己，表示要设法减少美国的“援助”，还逮捕了一批同美国来往密切的军官，监视亲美分子，使美国无从下手。吴庭儒并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把军队从南越撤走。他还故意旧事重提，揭露美国过去策划政变的事实，

表示对美国的新的政变策划有所准备。

到8月中旬，也就是洛奇去西贡到任前夕，美国在南越的政变准备已经差不多就绪了。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这时已经策动了曾经在法国殖民军中服务并在美国受过训练的杨文明，和吴庭艳的国防部长陈文敦，出来发动政变。洛奇的任务是去直接指挥这场政变。他在8月20日离开美国，先到檀香山同瑞尔丁、美国驻太平洋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等人举行了一次“战略”会议，预定23日到西贡。为了给杨文明打气。22日，美国新闻处就播发了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纸的一篇评论：《美国似乎需要一次反对吴庭艳的政变》。评论说：美国“将欢迎有一次政变来替换吴庭艳以及他的势力强大的家属。美国将会迅速承认任何接任的政府”。但是，吴庭艳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挫败了美国的计划。8月21日，吴庭艳按照杨文明等人的建议宣布全国戒严，同时命令自己的心腹孙室亭控制西贡，摆开了严阵以待的架势来迎拉洛奇的到来。正在东京的洛奇，奉命取消同日本外相的会谈，急忙在22日赶到西贡，但是局势已经在吴庭艳控制之下。

美国当然不会甘心。洛奇首先以进行“政府改革”为名，要求吴庭艳把吴庭儒从伪政府中驱逐出去。吴庭儒控制着吴庭艳集团的特务、警察和亲信的“特种部队”，排除吴庭儒，就为美国摆布吴庭艳扫清了道路，这个要求当然不会为吴庭艳接受。同时，美国积极招募和鼓励南越将领来发动政变。并且决定收买吴庭艳的心腹孙室亭。在美国策划下，杨文明等设法挑起孙室亭对吴庭艳的不满，把孙室亭拉了过来。同时，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同南越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部队进行频繁的联系。

在美国这一系列活动面前，吴庭艳并没有睡觉。他除了把亲信部队集中到身边以外，还把黄金外汇从美国银行取出运回